

从“天”与“人”看先秦儒家国家安全思想

陈李君

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……儒家经典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流传与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,它们谈论圣王贤臣,评议国事时政,心系安危存亡,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,形成了一系列稳定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安全思想。这些思想产生的时代虽已远隔千年,但其中部分先进理念仍然具有较高的史鉴价值。

“若夫成功,则天也”“畏天之威,于时保之”“天道赏善而罚淫”“夫是之谓天德,王者之政也”,儒家探讨的“天”,是天命、天道、规则;“穆穆在上,明明在下”“先有司,赦小过,举贤才”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,斯不亦惠而不费乎”,儒家论述的“人”,是明君、贤臣、万民。“天”与“人”是儒家经典永恒的主题,亦是儒家思想家们看待问题的出发点,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论述大致也是从“天”与“人”两种角度展开的。

具体言之,值得当代思考的先秦儒家国家安全思想主要包括四方面:

政治安全

一、“无疆惟休,亦无疆惟恤”

《周易》的《豫卦》和《既济卦》以辩证思维探讨了安与危的问题,指出“乐”与“忧”的两端相互依存,乐极生悲、乐极生凶,“初吉终乱”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在儒家思想家们看来,夏、商二朝本来受有天命,却落得覆亡的悲惨结局正是最典型的例子。继受天命,“无疆惟休,亦无疆惟恤”,固然是无穷的美好,可也是无穷的忧患;天命无常,守成艰难,“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

而不忘乱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”。应当时时刻刻心存危机意识,不可懈怠,应当目光长远,居安思危,做好准备迎接不可预知的挑战,当忧患真正成真时,才能有足够能力去应对,使得国祚绵长。

二、“食哉惟时,柔远能迩”

一国内部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,先秦儒家很早就认识到了“柔远能迩”,即安远须先使内部亲善的道理。修明内政,使“近者悦,远者来”,关键在于推行贤人政治,“舜有天下,选于众,举皋陶,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,选于众,举伊尹,不仁者远矣”“悼叙九族,庶明厉贤,迩可远在兹”,亲贤远佞,团结内部各族,施行仁政。政务由近及远、推及全境,国家内部“细无怨而大不过”,一来国力得以提升,二来可免外来祸难。

经济安全

一、“家主中雷而国主社,示本也”

要保证国家安全,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不可缺少的,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,发展和巩固经济基础的根本就在于农业。《礼记》有载“家主中雷而国主社,示本也”,祭祀土地以报答土地的恩情,表示土地是立家、立国的根本。“俾彼甫田,岁取十千。我取其陈,食我农人,自古有年”,田地广阔,庄稼茂盛,粮食丰收,祭祀求福……从这些情景可看到先秦时期对农业生产的重视,“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,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”,发展农业,节省用度,就不会贫穷;衣食充足而让百姓遵循季节规律劳作,就不会困苦。

二、“彼裕我民,无远用戾”

儒家的农本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本思想相互勾连的,“损上益下,民说无疆”,富民利民,才可实现长远的安稳。裕民,除了大力发展农业使民有吃食之外,一需轻徭薄赋,二要储粮备荒。“苛政猛于虎也”“耕者,助而不税,则天下之农皆悦,而愿耕于其野矣;廛,无夫里之布,则天下之民皆悦,而愿为之氓矣”,合理征税,

减轻人民负担,百姓便可安居乐业;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,无六年之蓄曰急,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”,这是忧患意识在经济安全中的体现,国家若有充足的财物储备和粮食储备,即使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,也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。

军事安全

一、“王用出征,以正邦也”

先秦儒家思想家们倡导仁爱精神,以和为贵、睦邻友好,但却不反对为了稳定社会环境而动用军事力量,所谓“王用出征,以正邦也。言所出征者,除去民害,以正邦国故也”。之所以讲出征这件事,就是要为民除害,以治理好国家。《左传》多载战争之事,也多见征战双方以签订盟约的方式结束争斗,从中可见儒家对损益的仔细考量与权衡,国家危亡之际,能以谋略取胜,在儒家思想家们看来这实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明智抉择。此外,儒家主张“夫战,智为始,仁次之,勇次之”,没有智慧便不知晓民意,不讲仁义道德战争便失去正义价值,没有勇敢的品质便无法获得胜利。合乎正道地发展军事、利用军事,才能为国家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。

二、“师出以律,否臧凶”

《诗经》的《采芣》描写了声势浩大的周军南征情景,赞美了训练有素,军纪严明的无坚不摧之师;《尚书》的《费誓》篇记载了鲁国军队的法纪,“乃越逐不复,汝则有常刑。无敢寇攘,逾垣墙、窃马牛、诱臣妾,汝则有常刑”,脱离战阵和队伍、违纪追赶牛马奴隶或不将其归还失主、抢劫盗窃等行为,都将受到刑罚,可见其中蕴涵的重视军队、法纪强军在内的较为丰富的思想。“师出以律,否臧凶”,军旅之事,关键有二,一在“众”,无众人不能组建军队;二在“正”,军队不正就没有战斗力。治国在于得人,治军也是一样的道理,军队的将领刚正不阿,严明军法,如此建设出的军队才是强大之师、正义之师。

社会安全

一、“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”

事物的顺利发展,通常都需要适度的“节制”。在儒家思想家看来,礼、乐、政、刑都是十分合适的“节制”手段,尤其是礼与乐,所以圣王才特别注重制礼作乐。“天下从之者治,不从者乱;从之者安,不从者危;从之者存,不从者亡”,遵循礼则国家可治,天下安定;不遵循礼则社会混乱,国家危矣。“礼节民心,乐和民声,政以行之,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矣”,从君主到百姓,人人遵守典章制度、不逾礼法,便可保秩序井然、和谐安定。在儒家看来,作为节制手段的礼地位十分高,作用也十分重要,它可用于预防,可用于区别,可用于规范。但是礼也不是万能的,只有当它和乐、政、刑相互配合与补充时,才能真正发挥出最大功效,真正实现“无怨”“不争”的良好社会状态。

二、“允迪厥德,谟明弼谐”

“城郭不完,兵甲不多,非国之灾也;田野不辟,货财不聚,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,下无学,贼民兴,丧无日矣”,治理国家,一靠军事发展,二靠农业生产,三靠教化民众,“允迪厥德,谟明弼谐”就是在强调以德进行民众教化。在儒家理想的“大同社会”与“大顺社会”里,动荡不安和混乱都不复存在,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与安宁,其中,德的作用尤其重要。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”,刑罚只能从外在来打击犯罪,而不能使人民从内心从善,但是道德能从内心来教化人民,使每个人都有廉耻之心,从而真正抑制犯罪行为,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。“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,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,无之”,治国在齐其家,家庭的管理,最好的方法是树立孝悌、仁慈、礼让等道德观念,用推己及人的恕道,把这种观念推广到社会,社会也会和谐安定。

(作者单位: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摘自《人民法院报》)

感悟一眼泉

王影

东晋时,广州城二十里外有一口甘泉,传说为官者若饮此水便起贪心,故此泉名为“贪泉”,为避贪名,过往官员皆不敢饮。而吴隐之新任广州刺史,听此消息后,觉得饮贪泉水便起贪心乃无稽之谈,慨然饮之,并留《酌贪泉赋诗》:“古人云此水,一啜怀千金。试使夷齐饮,终当不易心。”诗中所说的“夷齐”是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,倘若让伯夷、叔齐这样的高洁之士来饮贪泉,他们也不会生发贪心,关键在于心,而在于心。吴隐之生活节俭,任内廉洁奉公,始终保持了清白节操,成为佳话。后世诗人纷纷借助贪泉这个意象,发表自己的议论,仅唐代便形成了数量众多的饮泉诗。

白居易在《广府胡尚书频寄诗因答绝句》中这样回应朋友:“尚书清自临南海,虽饮贪泉心不回。唯向诗中得珠玉,

时时寄到帝乡来。”他认为朋友虽饮贪泉,但一定会像吴隐之一样不改清操,他希望朋友到了广州后,能与他诗文唱和,在相互提醒中也可促进廉洁,这种精神财富最宝贵。李群玉在《石门戍》中发问:“人来皆望珠玑去,谁咏贪泉四句诗?”世人为何还是对珍珠宝石这样的身外之物追逐不已呢?谁又在怀念与珍惜吴隐之的高尚品德?轻声一问,发人深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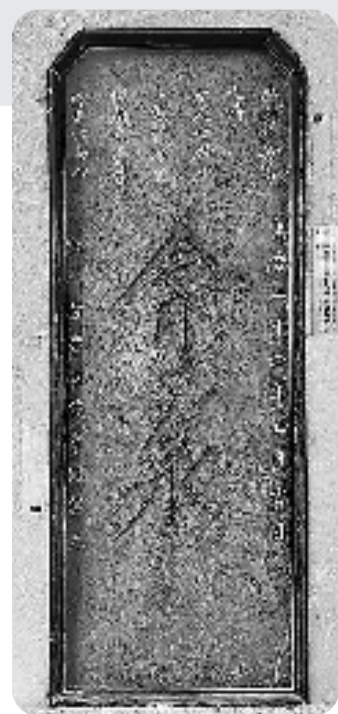
皮日休在《聪明泉》中说:“欲知心不变,还似饮贪泉。”庐山有一口聪明泉,皮日休认为饮了聪明泉水不会变聪明,饮了贪泉水也不会变贪婪。温庭筠在《过孔北海墓二十韵》中激烈地写道:“恶木人皆息,贪泉我独醒”,古人有云:“士怀耿介之心,不荫恶木之枝”,温庭筠感叹人们栖息在恶木之下乘凉,而他虽饮贪泉却仍很清醒,表达了自己不容于世的悲愤之情。陆龟蒙则在《奉和袭美寄琼州杨舍人》中抒发豪迈:“只以直诚天自信,不劳诗句咏贪泉。”还有什么比

拥有正直更让人无所畏惧的呢?管它什么贪泉廉泉,都不能对我形成任何干扰。

而王建、张祜仍然拒饮贪泉,分别在《寄崔列中丞》和《寄迁客》中写道:“贪泉誓不饮,邪路誓不奔”“瘴海须求药,贪泉莫举瓢。”其实,两人并不信饮贪泉水就会变贪婪,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,以贪泉为鉴,以不饮贪泉来明志。自古正邪不两立,廉与腐决不相容,必须在内心守好红线,不可做一丝一毫有损廉洁之事。

为何一眼贪泉引发后世那么多的感悟呢?其实,自从吴隐之饮过后,贪泉的存在就只是证明了一个道理:一个人的贪廉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品质。虽然外在环境有种种诱惑,但那是外因,外因最终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。信念坚定、意志坚强的人,自有廉洁底气,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碍一泓泉水何事?

(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



现陈列在广州博物馆中的“贪泉碑”,此碑原立于贪泉旁,以警示官吏勿贪 资料图片